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



王友胜
著

本书全面描述与论析苏轼诗歌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存世的历代有关苏诗研究史料予以辑录、考辨和阐释，对其中一些重要的著作，如年谱、传记、选录、评点、注释和研究著作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历代研究者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以及文学观念亦作了初步探讨。书中从文艺学、文献学及学术史等多角度切入，既可观照历代文艺思潮的变化，又可促进对苏诗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利用，更可为当代的苏诗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中华书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苏诗研究史稿

(修订版)

王友胜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王友胜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7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7400 - 0

I. 苏… II. 王… III. 苏轼(1036 ~ 1101) - 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4337 号

书 名 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

著 者 王友胜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1/32 毫米 1/16

印张 22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400 - 0

定 价 56.00 元

序

王水照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创造乃至文化创造有着恒久不衰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诗人和一般读者。清代何仁镜《东坡事类序》中甚至说:“唐而来学士大夫,其声名饴人耳目,大抵以先生为最。”把苏轼推为宋以来知名度最大的作家。因而,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部接受史,以 2700 多首苏诗、300 多首苏词、4800 多篇苏文为解读接受的对象,又分属以理论阐述为主的学术研究,以作家创作借鉴为特点的文学创作,以阅读鉴赏为内容的大众阅览等三个层面,采取评论、笺注、编选、年谱、传记、吟诵、唱和、刊刻、传抄等不同传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理应成为“苏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但迄今尚未见有关论著问世,不能不是很大的缺失。

这种缺失对“苏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传统学术中原有“学术史”或“史料学”等分支,似与“接受史”学科范围相类或相关。但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崛起的西方接受美学的传入,使我们对此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即把文学创作活动的完成过程,从只限于由作家到作品而止,进而延伸为作家→作品→读者。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一旦从作家手中脱稿,还不是有意义的存在,只有进入流布过程而为受众所接受并解读,作品才实现其价值。正如劳动产品只有经过交换才获得“价值”,甚至单单用以满足自己需要、不当作商品出售的产品,都不具有“价值”。尽管接受美学也有片面强调读者视点而忽视作品本义的偏颇,然其对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领域的扩展、作家作品意义的挖掘与增值、变异乃至对接受者的时代阅读环境的探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

喻的。

王友胜博士的这部《苏诗研究史稿》第一次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析,对本专题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结构框架、研究方法诸问题发凡起例,纲举目张,思致颇密,用力甚劬,其草创之功,值得称道。这对建立并进一步完善本学科的体系与规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作为“史”,作者着眼于梳理、归纳历代接受苏诗的全过程,亦即探究苏诗升沉起伏、曲折多变的历史命运。分期问题是一切历史著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期不仅为了寻找一个方便而又符合历史原貌的叙述结构,更为了提示其每个时段的不同内容、特点和趋向,从其所反映的各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思潮和审美趣尚中,研究历代接受者对苏诗意义与价值的不断重新阐释,何者被突出和强调,何者又被淡化和忽略,从而更全面深刻地把握苏诗的内在意蕴,也探求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本书把清以前的苏诗研究史划分为形成期(两宋)、过渡期(金元)、低落期(明代)与繁荣期(清代)四个阶段,并从具体论述各时期的主要成就和大量事实中,概括出“两头热、中间冷”的研究趋势,又对形成此一趋势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我以为这一整体把握是颇为准确的,也为全书论证的展开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依据于“两头热、中间冷”的宏观把握,本书以两章的篇幅论宋,三章的篇幅论清,重点突出,眉目犁然,也是作者用力最多因而亦多见精彩之处。全书的主要创获有:一是对历代苏诗的注释著作作了系统的研究。对每种重要笺注本,举凡编撰缘起、成书过程、编次、体例、成就、局限与影响等相关问题,均一一作了深入的探讨。二是对历代苏轼诗集的编刻,对苏诗的辑佚、辨伪与系年等问题作了稽考。如对宋代《注东坡先生诗》的诗歌系年,明代《东坡续集》、《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的辑佚,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诗》的辨伪工作,均有更细致的考评。三是对历代苏诗论评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再评述,尤对每一时期的主要相关文学流派及主要苏诗研究者的苏诗观,给予有相当学术尝试的述评。还对某些苏诗研究者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手段作了分析与阐说。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作者的以实证为基础的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是密不可分的。作者自觉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点、线、面的

参证互补,使全书在本论题范围内尽可能地臻于完整,尤致力于论证的平实可信。如对清代两部具有总结性的苏诗注本,即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和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评估问题,历来意见并不一致。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过:“王文诰的夸大噜嗦而绝少新见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清代中叶做了些总结工作。”一则说他“夸大噜嗦而绝少新见”,一则说“做了些总结工作”,对其优点和缺点均有涉及,可谓一语中的。本书作者亦持此种分析辩证的态度。书中热情肯定冯氏荟萃旧注、补注苏诗和纠前人之误的三大主要成就,而对王氏,既认为他对苏诗注释绝少发明,其评点则或有可取之处,但对他不遵守学术规范,借揆击前人而抬高自己的不良学风,就坚决予以摈弃。这一评估是作者从两书的具体注评中,两两对勘,认真考辨,广泛取证而得,因而语虽尖锐而理却坚确,是可以信从的。要之,本书清晰地勾勒出近千年苏轼诗歌研究的历史进程,对种种重要的人、书、事作了切实可信的评述,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为今后更全面、更深入的苏轼接受史的诞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友胜君自1996年春来复旦大学从我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此前则执教于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又学成回归原校任教。他在复旦园三历寒暑,刻苦攻读,锲而不舍,毫不懈怠。其间除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外,还发表其他论文约20篇,不少刊载于著名刊物。他又与陶敏教授合作编撰了《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学术质量颇高;并独立完成《中国历代文学经典·唐宋词卷》(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笺释整理工作。除了勤奋,他还敏于思索,对材料的搜集、梳理和阐述能力均达相当水平,“出手”尤较迅捷,文思流畅,表达亦称清利。这些应是治学的良好素质或条件。因而树立追求学术精品的目标,就显得更为重要。语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立志高远精诚,临事专默沉潜,孜孜矻矻,循序致功,于此我实有厚望焉。

是为序。

2000年2月8日

目 录

序	王水照 1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有关选题的几个问题	1
第二节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4
第三节 苏诗研究史分期	9
第四节 方法论	15
第二章 宋人对苏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9
第一节 苏诗的早期编刻与流播研究	19
第二节 施元之等与《注东坡先生诗》研究	26
第三节 王十朋与《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研究	40
第四节 宋人所撰苏轼年谱研究	55
第三章 宋人论苏诗述评	69
第一节 苏黄优劣之争概述	69
第二节 苏门文人论苏诗的分歧及其原因	72
第三节 江西诗派论苏诗的基本倾向	85
第四节 理学家论苏诗的得失	88
第四章 金元的苏诗研究	94
第一节 刘辰翁的苏诗评点	94
第二节 方回的苏诗评点	98
第三节 王若虚与元好问论苏诗	104
第四节 苏诗对金源诗歌创作的影响	112
第五章 明代的苏诗研究	118
第一节 苏诗的编刻与辑录	118
第二节 苏诗的选录与评点	128
第三节 明人对苏诗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	137

第六章 清人注苏诗研究	152
第一节 清人注苏诗的繁荣及其原因	152
第二节 邵长蘅等与《施注苏诗》	157
第三节 查慎行与《苏诗补注》	171
第四节 翁方纲与《苏诗补注》	189
第五节 冯应榴与《苏文忠诗合注》	204
第六节 王文诰与《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216
第七章 清人的苏诗评点与选录研究	226
第一节 清人选评苏诗的全面繁荣	226
第二节 查慎行的苏诗选评	228
第三节 汪师韩的苏诗选评	236
第四节 纪昀的苏诗评点	242
第五节 清代的苏诗选录研究	254
第八章 清人论苏诗述评	262
第一节 清初文人论苏诗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262
第二节 袁枚对苏诗的批评	271
第三节 赵翼的苏诗观	275
第四节 方东树论苏诗	286
第五节 张道与《苏亭诗话》	294
结束语	304
附录	307
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	307
历代苏黄诗优劣之争及其文学史意义	324
参考征引文献举要	336
韩国版后记	347
后记	350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有关选题的几个问题

国学大师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比较清代乾嘉时的学术流派,批评惠派治经时视汉儒为神圣,不敢有所出入,立论又仅凭断章零句,殊觉片面;戴派则对旧注旧疏不轻易信从,每发明一义,须稽考群书方可得。由此他得出结论:“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①按梁氏此处没有使用诸如“学术史”、“研究史”之类的术语,然详其前后语意,又据他论学重史的一贯作风,所云“此学之真相”当指一门学科的基本文献及历代阐释过程中积淀起来的丰厚成果。他认为凡治一学必有两个步骤:首先须摸清家底,了解本课题的历史现状;其次再在前人的基础上或纠误补漏或另辟蹊径,作更深入、全面的再研究。梁氏所标举的这一治学主张对研究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厚遗产的古典文学颇具启发与借鉴意义。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在经过思想上拨乱反正后,既重视古典,又撷采西学,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已超过本世纪前八十年的总和。就研究格局来说,侧重经验的实证的史料整理与注重理性的思辩的理论建构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充分。其不足之处是,史料整理者过多地局限于校勘、标点、辑佚、笺注、考证等文献学的范畴内,所做的工作亦称精密,几与历史真实接近,但较少与文学、文艺学的探讨结合起来;研究者的

^① 《清代学术概论·十二》,《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37页。

学术思想、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很难体现;理论述评者探讨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其功不少,但往往将视野投向现实,或崇尚“向西看”,部分学者热衷以现代思想与西方观念改造古典,而对研究课题的丰厚遗产缺乏应有的了解,有的甚至相当漠视。因此,既汲取以上两者之长,又避其短的最好方法当是在史料整理与理论述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找到适当的衔接点,让两者“嫁接”,结出新的果实。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从学术史的角度,以当代学人特有的学术眼光对古代某些经典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的研究史料进行辑录、甄辨,并对其作出准确的诠释与阐释,对某些焦点问题集中分析,探讨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既加深、拓展我们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又丰富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的内涵。所以,一位资深的学者曾深有体会地说:“中国古典文学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需要有中国文学创作史的著作,同样需要有中国文学研究史的著作。我们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历史的审视,这样可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学术背景。也就是说,要开展对研究的研究。”^①这一学术呼声已过去了十年,平情而说,正如这一学者所预料的,当今学术界对学术史的探讨已蔚然成风,许多学者正在梳理晚近及民国时期学术大师们的学术思想,整理其学术成果。这自然是对的,颇具紧迫性与必要性。但笔者以为,切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准突破口,对某一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或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作研究史的探讨,或许更为实际而有价值。如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黄中模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稿》,钟优民的《陶学史话》、《陶学发展史》,齐治平的《唐宋诗之争概述》,许总的《杜诗学发微》,台湾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蔡振念的《杜诗唐宋接受史》等皆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的力作。纵观前辈学者的治学路数,没有一个不重视传统与史料的,但也没有一个就此止步而不深究的。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以苏诗研究史为论题,拟对苏诗研究的历史面貌作整体的、系统的、详尽的描绘和评述。古代作家成千上万,本文选择苏轼为范例,进行个案研究,并非笔者的随意所致,因为苏诗颇具

^①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注序》,见该书卷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页。

典型性:第一,苏诗数量丰富,题材广阔,艺术上有得有失,前人的评价分歧很大,比勘各家的异同,可得到许多新启示。第二,历代苏诗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可供挖掘与开垦的领域极多,迄今为止,尚有很多研究成果无人整理,亦有不少学术命题、研究规律无人探讨。第三,苏轼与黄庭坚齐名,“苏黄”并称,历来被视为宋诗的代表。通过对苏诗研究历史的再研究,可以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宋诗的特质与面目,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包括苏诗在内的宋诗为历代学者所接纳的复杂过程。

本课题属学术史的范畴,理应在“学”与“术”两方面着力。“学”指历代苏诗研究的基本内容,如对苏诗的辑录、整理与注释,对苏诗的系年、校勘与真伪考辨,对苏诗的选录、评点与研究,还包括对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年谱、传记的写作等内容。“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原则,也指众多研究者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气、影响以及所体现出的时代学术思潮、文艺思想等。以上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本文的重要内容。在写作体例上,本书采取传统教科书模式,按宋、金、元、明、清时间顺序分章介绍,在对研究家的研究时,先述其生平、学行,再论其成果得失,有些类似学术史著作中的“学案体”。但为了避免囿于体例而对文学规律的割裂,故有时亦设小节对某个学术命题作远观俯察的专题探讨。

最后,对论题“苏诗研究史稿”略作解释。“苏诗”一词亦非笔者的随意简省。鉴于苏轼诗歌的巨大成就,古人诗话、笔记中多以“苏诗”称之^①，“陶诗”、“杜诗”、“韩诗”之称亦类同如此。长此以往,约定俗成。李白、白居易、黄庭坚、陆游等著名诗人则未有此殊荣。目前的学术文章中,“接受史”这一术语运用得比较频繁。但一般而言,古典诗歌的接受史研究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以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研究者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第一种情况通过选本的形式实现,第二种情况通过注释、评点、论评等方式实现,第三种情况通过作家的创作实现。本书对第一、三种情况仅略有涉及,而侧重点则放在前人对苏诗的阐释上,即对苏诗的注释、选评与

^① 按:“苏诗”之称始于旧题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其中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

论述上,故曰“研究史”,既通俗,又近于实际。再者,数百年来苏诗研究的材料卷帙浩繁,所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本书限于篇幅,仅就每个时代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和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评述,遗珠之憾,在所难免;对专书的研究,对一些研究现象的探讨都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有的还有某种简单化、平面化的倾向,未能展开详尽论述,故本书远远不具备“史”的要求,称之“史稿”,并非谦词。苏轼是全能作家,诗、文、词兼备,又善书法、绘画,可谓多才多艺。本书紧紧围绕题中之义,主要探讨苏诗研究的历史,有时从实际需要出发,也顺便论及苏文、苏词,而对书法、绘画方面的研究历史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材料的匮乏,功力的不足,自是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过于枝蔓,有时会冲淡对本课题的研究。

第二节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苏诗的研究是全面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苏诗的研究史作全面系统的考察,总结、分析与评判历史上苏诗研究的丰硕成果,迄今仍是一个值得拓展、深化的学术领域。有关这一论题的专著付诸阙如,仅有的几篇文章所涉及的研究面非常有限,不能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与苏诗文本的研究盛况比,还薄弱得多。造成这一研究格局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研究者思维的惰性和开拓意识的淡薄外,还与研究资料的不易获取有关。比如宋人所撰的苏轼年谱,所注的苏诗著作许多已佚或仅存残帙,有的还流布域外,一般读者无从省览;明清注释、选评、研究苏诗的著作绝大部分未经整理出版,还处于原初状况,且庋藏于个别图书馆,流布不广,无法加以充分利用。本书勉为其难,知难而上,意欲弥补苏诗研究中的这一“缺环”,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学术开创性。

但是,视角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终究只是文学研究中形式的更易,还属于现象层的范围。本书开展对历代苏诗研究的再研究,其意义远非仅此。具体说来,其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尚有如下数端:

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考察苏诗研究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人的丰硕成果,汲取其学术养分,提高研究起点,使学术研究走上规

范化道路。

作为一门有着丰厚内涵与悠久历史的课题,苏诗研究在作者生前即已开展,而在以后长达约九百年的进程中,历代学者研究苏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无论是辑佚、辨伪、选编、笺注、考证、评点、解说、鉴赏,抑或是传记的写作、年谱的编撰、诗歌的系年、诗艺的探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就这些成果的呈现形态来说,有的以整部著作的形式出现,有的则散见于各种诗话、笔记、书信、序跋、书目以及论诗诗中。就其学术质量而言,有的精深,有的浅薄,有的一语中鹄,有的牵强附会。从事苏诗研究史的研究,就必须对这些材料认真辑录、考辨与准确理解,归纳分析,比勘异同,看看历代关于苏诗研究有哪些学者与著作,他们在苏诗研究史上地位、影响如何,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地方说得不对,需要订正,又有哪些地方存在疏漏,需要补充完善。再者,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什么手段与方法,体现出了什么样的观念与风气,能给我们进一步研究以什么样的启示,等等。这种建立在充分利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的研究,既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又可免除因闻见未遍或思虑不周而导致的妄说臆见,使自己的研究品位更高,结论更可信。学术研究总是历史的、动态的与发展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后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与基础,如同人类繁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有不少苏诗研究者对苏诗研究的历史缺乏了解,漠视或者不知道前人在相关问题上的各种歧见,立论时或无从采择,或仅就浏览所及随意摘引,以此作为填补其理论框架的材料。比如有学者摘录《诗人玉屑》卷七引《漫叟诗话》、《石林诗话》卷上及《风月堂诗话》卷上肯定苏诗用典的材料得出苏诗用典博赡、浑厚、精确的结论^①。苏诗用典确有精妙的地方,但亦有堆砌典实、了无性情者,从南宋张戒、严羽,到王若虚,再到王夫之等人对此多有讥评。文章却忽视了这一点,从而给人以错觉,不能正确认识苏诗用典的得失。还有一种情况,即对前人旧说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对古人立说的政治背景、学术生态环境以及身世遭际、世界观缺乏研究,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毫无谅察,立论援据时即如清代学者戴震所批评的:“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儒以

^①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1月版,第532—535页。

附骥尾。”^①或贬斥前人以抬高自己,或不加别择地盲从旧说,前者“以己自弊”,后者“以人弊己”,这都不是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方法,以此研究,其结论难免主观片面。举例来说,清初叶燮说:“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按指苏轼等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②若不体察叶氏处在清初尊唐宗宋的学术环境中,针对明中期以来贬斥宋诗的现实,大力倡导宋诗的良苦用心,对于这种偏激的言论盲目信从,或一味指责,于科学研究都将徒劳无益。与此相反,开展苏轼研究史的再研究,认真梳理历代论评苏诗的史料,把握论者立说的学术背景,准确理解史料,则可消除苏诗研究中主观、片面、武断的作风,使学术研究更科学,更规范。对此,清人方玉润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③方氏指出说《诗》“持正论”的前提是荟萃众说,比勘异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该课题的研究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其次,从文艺学的角度说,考察苏诗的研究历史,可反观历代文艺思潮的变化轨迹,为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的建构提供生动的例证。

苏诗研究史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侧重描绘与述评历代苏诗研究者所涉猎的研究领域,所进行的研究活动,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所体现的研究思想。它虽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若将其中的一些突出现象放到特定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中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深入的认识。苏诗研究史的探讨中体现出的一些规律性结论亦可反过来丰富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的内涵。苏轼是大家,其诗吸取了前代诗人的丰富营养,又逐步摆脱不利因素的干扰,从而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风貌。所以苏诗不仅表示苏轼诗歌这种单一内涵,它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审美的传统,一种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特定的质态,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与示范性。苏诗研究也打上时代烙印,敏锐地体现出文艺思潮的变化。如果我们将苏诗放到特定的学术文化背景中,将其作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来进行考察,就会得到许多新认识,受到许多新启发。譬如明代中后期的文

① 《戴东原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四部备要》本。

② 《原诗》卷三《外篇上》,《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1版,第598页。

③ 《诗经原始·凡例》,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第3页。

人对苏诗成就、地位的评价各不相同,其中就透露出了诗坛尊唐宗宋之争的文学现象。尊唐者否定宋诗,谓宋无诗^①,自然将苏诗的成就一笔抹杀;而宗宋者态度同样偏激,往往对苏诗彰扬太甚,以为苏诗优于杜诗^②。两者迹异而实同,都不能全面评价苏诗创作的得失。对苏轼的政治诗、和陶诗、次韵诗以及苏诗喜议论、说理、大量用典等现象,历代论者的评价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些分歧有的产生在经学家、理学家与诗论家之间,有的反映在文学内部不同的诗学流派及不同的创作风习之间。通过研讨其言论,比勘其异同,以此进一步探索其不同观点的学术渊源、相互关系及所产生的学术文化背景,同样可看出论者的诗学观及其所处的时代文艺思潮。

再次,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探讨苏诗研究的历史,亦可促进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运用。

学术研究中,文献资料的获取与运用,决定研究品位的高下优劣。资料掌握得越充分,立论的依据就越多,研究的水准就越高。对像苏轼这样的经典作家接受过程的描绘与评述,资料的占有尤为重要。因为历代研究苏诗的资料之繁多、评论苏诗的意见之纷纭,在古代作家中都非常突出。若对有关文献史料不全面搜集,立论时难免主观片面,以偏概全。具体而言,历代苏诗研究的文献包括以下内容:(1)辑录、整理苏诗的全集、专集。(2)选录、评点苏诗的著作。(3)注释苏轼的著作。(4)有关苏轼的年谱、传记。(5)论评苏诗的片断言论、专文或专著。当今学术界对苏诗文献的整理作出了一定努力,如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46卷已经点校整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已经出版,尤其是《苏轼资料汇编》对散见各书的苏诗研究资料作了大量的辑录^③。但这一工作还很不充分,尚有许多有学术价值的史料没有被辑录、整理,直接妨碍了当前苏诗研究工作的深入。散见历代作家、学者著作中而未被辑录的片断言论或专文尚且不说,即以完整的

① 参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八《潜虬山人记》、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八《杂言》。

② 参《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与李龙湖》。

③ 按:《汇编》并不全面,或囿于体例,或限于闻见,其遗辑漏收者尚不在少数。参谢桃坊《〈苏轼资料汇编〉拾补举例》,《文献》1998年第2辑。又,笔者亦发现漏收的资料,如谢枋得《叠山集》卷二《重刊苏文忠公诗序》未收,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七载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元祐间同聚苏轼之门一条亦未收,此为苏门“四学士”并称的最早记录。

著作而言,就还大有事情可做。比如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合注的《注东坡先生诗》42卷,元明后已佚,清初宋荦搜访到南宋嘉定间所刊施顾注之残本,交给邵长蘅等人从事恢复宋刊原貌的工作,由于操作手段失误,结果画虎类犬,颇受后人讥评。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等人在注苏诗著作中对施、顾注文作了一定的辑录,然亦不完备。现尚存四个残本于世^①,若能去其重复,将其整理成一个比较接近宋刊原貌的施、顾注本,将会有益于苏诗的注释与研究^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三“宋刊施、顾注苏诗跋”条中即表达了这一愿望:

余窃谓施、顾注本传世本稀,自袁氏藏本被燬,惟松禅师(按指翁同龢)此帙存卷独多,断为海内孤本秘笈。倘得有志者取原书精摹印行,不妄增减一字,所缺之卷只录本文,无烦补辑,庶几神明焕然,顿还旧观,一洗邵、查诸氏素脱之失。余蕴蓄于怀久矣,聊于此妄发之,嗜苏之士,并世不乏其人,有能锐心奋力以助其成乎?余日夜引领而望之矣。^③

按傅氏所云袁氏藏本,指宋荦旧藏30卷本,后由翁方纲传至吴荷屋,再传至叶润臣。光绪季年为湘潭藏书家袁伯夔所购,未几遭火,仅存19卷。翁同龢所藏为郑羽补刊本34卷。目前海禁大开,外流珍槧纷纷重返中土,傅氏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又如清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50卷,翁方纲《苏诗补注》8卷,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50卷都颇富学术价值,值得整理出版。目前清人注杜诗已经出版了《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诗镜铨》及《读杜心解》等好几种,研究、评点的书则出版得更多。相比之下,苏诗才整理出版了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一种^④,而其中于苏轼生平、苏诗系年极有参考价值的《苏文

① 按:四个残本是缪荃孙所藏4卷本,黄丕烈所藏《和陶诗》2卷本,宋荦所藏19卷本,翁同龢所藏郑羽补刊本(34卷)。四本去其重复,尚缺卷一、二、五、六、七、八、九七等卷。

② 按:郑骞、严一萍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嘉定原刊本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苏诗佚注》辑得的施顾注佚文6卷,汇编成《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年版。又,王水照师《校注足本施顾东坡先生诗》一书亦在辑校中。

③ 《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693页。

④ 按:黄任柯、朱怀春标点的《苏轼诗集合注》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忠公编注集成总案》45卷却未曾点校整理^①，未免双璧缺一，让人遗憾。本书开展对苏诗研究史的探讨，拟对历代一些注释、评点与研究苏诗的重要著作进行述评，探讨其成书时间与过程，评述其体例、内容、成就与局限、影响，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让更多有价值的苏诗研究成果得以出版问世。

第三节 苏诗研究史分期

清代同光体著名诗人、诗论家陈衍《知稼轩诗叙》云：“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复炽。二百余年中，大人先生殆无不濡染及之者。”^②陈氏此处虽仅就苏诗对后世作家创作的影响史而言，然其研究史实与此同步。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亦以此为思路，对历代苏诗研究的历史作如下分期：

1. 两宋——苏诗研究的形成期。
2. 金元——苏诗研究的过渡期。
3. 明代——苏诗研究的低落期。
4. 清代——苏诗研究的高峰期。

宋代的苏诗研究在苏轼生前即已肇端，迄至宋末约二百年的历程。苏轼生前即诗名卓著，其诗以刊印、传抄、刻石、歌唱及其亲笔手迹等形式流布宇内，甚至少数民族地区亦有其诗的传播。《东坡集》、《东坡后集》、《眉山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和陶诗》以及《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汝阴唱和集》等合集已经编撰，部分曾经刻印。此间的苏诗论评主要集中在其师长、友朋、同僚与及门弟子之间。从存世文献来看，年长于苏轼四十八岁的张先是宋代第一位论评苏诗的作家，其《定风波令·再次韵送子瞻》谓东坡“文章传口齿牙清”，其师欧阳修《举苏轼应制科状》亦谓其“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饰，名声甚远”^③。其父执张方平甚至将苏轼许为“文学实天下之奇才”。苏门文人对苏诗的看法分歧较大，批评

① 按：王文诰《总案》45卷有巴蜀书社1985年11月据嘉庆原刻影印本。

② 《石遗室文集》卷九，光绪三十一年武昌刻本。

③ 《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二，中华书局2001年3月版，第1706页。